

「法式女性主義」的史家論戰與理解歷史的兩種方法：莫娜·奧祖夫的「歷史批判」和瓊·斯科特的「批判歷史」*

秦曼儀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本文探討法國大革命史家奧祖夫（Mona Ozouf）於 1995 年出版的《女性的話語》（*Les Mots des femmes*）及其引發的論戰如何加速法國婦女史的「性別轉向」，透過她和美國女性主義史家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就法國兩性文化展開的辯論（包含 2011 年的「法式女性主義」〔“*Féminisme à la française*”〕論戰），指出雙方衝突的核心涉及兩種理解歷史的方式：前者以「歷史批判」（“*histoire critique*”）的方式書寫民族，後者以法國為研究對象的「批判歷史」（“*Critical History*”）則是為了拆解共和主義的普世主義等建構當代法國民族認同的敘事。

關鍵詞：奧祖夫、斯科特、歷史批判、批判歷史、女性的話語、婦女與性別史

* 收稿日期：2023 年 9 月 18 日；接受日期：2024 年 1 月 22 日。

致謝詞：本研究最早於「近代早期法國婦女史」課程上發展初步想法。特別感謝衣若蘭教授，在其邀請之下，筆者曾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史精進班發表階段性研究成果，並終以書面論文形式呈現。文稿承蒙匿名審查人和《女學學誌》編委會惠賜的寶貴評閱意見、建議與校正，在此深致謝忱。

一、緒論

2011 年，美、法主流媒體上發生了一場長達半年之久的「法式女性主義」（“*Féminisme à la française*”）論戰。¹參與論辯的兩位關鍵人物分別是美國女性主義史家瓊·瓦拉赫·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及以法國大革命史研究享譽國際的莫娜·奧祖夫（Mona Ozouf）。雙方就「法式女性主義」一詞展開一系列針對兩性文化與性別問題的論爭，兩人交鋒始於 1995 年奧祖夫發表的《女性的話語：兼談法國的獨特性》（*Les Mots des femmes. Essai sur la singularité française*，以下簡稱為《女性的話語》），以及該書引發的書評事件。

有關本文討論的這兩位史家，臺灣婦女史研究社群更熟悉提出「性別作為歷史分析的一個有用範疇」的斯科特。斯科特在一篇 1986 年以此為題的文章中，將「性別」定義為一種概念工具，用於辨析社會與歷史上建構兩性不平等權力關係和規範體系等支配性結構（Scott, 1986）。對斯科特而言，性別研究賦予了誕生於第二波女性解放運動的婦女史不服從既有學術常規和知識論框架的行動力，即所謂「批判歷史」（“Critical History”）。而相較已在美國學科化的「婦女與性別史」，法國學界由米雪樂·佩羅（Michelle Perrot）開創的婦女史，則至 1991-1992 年《西方婦女史》問世後，²才擺脫長期處於法

1 美法學界一般使用 “*féminisme français*”、“*french feminism*”；論戰期間，法國社會學家岱里（Irène Théry）率先提出 “*féminisme à la française*” 用語，本文將於第三小節詳述論戰始末和相關用語出現脈絡。法國史家 Pascale Barthélémy 彙整了這場論戰的文獻資料，建立「法式女性主義檔案」（Dossier “*le féminisme à la français*”），網址 <https://www.mnemosyne.asso.fr/mnemosyne/category/actualites/dossier-controverse-a-propos-du-feminisme-a-la-francaise/>

2 本文根據英文版書名翻譯；法文原版書名是《婦女史》（*Histoire des femmes*）。

國學界邊緣位置的處境。³ 然而，這套五冊的婦女史暢銷書，「性別」一詞及其批判性概念的闡釋，卻僅出現在英譯本第一冊，由斯科特和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共同署名的序言之中（Davis and Scott, 1992）。在《西方婦女史》接受來自法國國內和美國學者多方批評意見之際，奧祖夫透過新作《女性的話語》表達她對好友佩羅和婦女史的支持。奧祖夫在書中回溯歷史，強調法國向來重視融合與對話的兩性交往文化，此一民族獨特性讓她質疑美國女性主義與性別研究會將對法國社會和學術界產生負面影響。這本以民族史角度撰寫的婦女史著不僅招致斯科特的嚴厲批評，甚至加速法國婦女史界的「性別轉向」。

從結果論，2011 年媒體論戰結束至今十餘年間，性別研究已擺脫法國學術界的邊緣屬性，成為社會科學經驗研究的核心概念工作之一。⁴ 美國的其他女性主義批判，如關注跨性別身分問題的酷兒理論，用於識別與分析性別、族裔、社經階級等多重疊加之不平等權力關係的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研究等，也隨之引介並豐富法國的婦女和性別史研究。只是，論戰期間加諸奧祖夫的《女性的話語》、「法式女性主義」和相關民族文化認同論述的保守主義標籤，似乎並未因為性別研究取得蓬勃的發展和學術的合法性而脫落，反而

3 相較美國在 1968 年第二波女權運動期間，婦女史即伴隨婦女與女性主義研究的興起而學科化，法國要到 1973 年，大學始開設婦女史課程。有關當代法國婦女史學史的最新研究參見：Zancarini-Fournel（2010a）。

4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在 2012 年首次成立性別研究所（Institut du genre），該所於 2014 年舉辦法國第一場性別研究會議。另外，創辦於 1995 年的婦女史期刊《克里奧：歷史、婦女與社會》（*Clio. Histoire, Femmes et Sociétés*）也獲得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經費挹注，於 2013 年更名為《克里奧：婦女、性別、歷史》（*Clio. Femmes, Genre, Histoire*）並添增英文線上版。

更形牢固，成為新世代學者標示學術世代差異的敘事養分。如荷布西斯（Camille Robcis）為一部集八十餘名學者之力完成的《性別批判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critique du genre. Corps, sexualité, rapports sociaux*）（Rennes, 2016）所撰寫之推薦文所示：

在二十年前，這樣的作品在法國學術界是不可能出現的……人們可能還會想起莫娜·奧祖夫在同一時間對於性別解釋的「極大化」——即性別是一種「純粹的權力關係，一切都被歷史和社會構建」——提出的警告，她指出，這是一個源自激進女性主義的美國給出的定義，這個概念在法國「聽不懂、看不懂，有時甚至無法翻譯」。在那些年裡，伊麗莎白·巴丁德（Elisabeth Badinter）、西爾維安·阿加辛斯基（Sylviane Agacinski）和阿蘭·芬基爾克勞特（Alain Finkelkraut）等作家經常讚揚幸福的異性關係為「法國的例外」（*exception française*）特質。他們聲稱，兩性的共同教育、誘惑和文明的承諾使得法國不受性別的理論和政治攻擊之累。然而，二十年後的今天，這本《性別批判百科全書》主要由法國學者撰寫；這些學者大多隸屬法國一流大學和研究機構。對他們而言，閱讀和引用美國和外國的資料不再被看作是一種背叛國家的行為，而是一種交流對話。（Robcis, 2017）

荷布西斯透過法國學界接受性別研究的今昔對比，來彰顯新舊世代學術文化和研究典範的轉移。為此，文中除了列舉拒絕接納性別研究的學者，突出其觀念的保守性，甚至影射他們帶有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言說和立場，曾造成當時法國學界的寒蟬效應。本文認為，在性別研究已扎根法國學界並取得豐碩成果的勝利時刻，亟需將荷布西

斯稱許新世代研究者對美國等外國思想和文化，抱持交流對話的開放性，帶向理解舊世代，而非停留於對相關人事物標籤化的認知模式。為此史學史的研究關懷，本文聚焦奧祖夫和斯科特圍繞《女性的話語》一書展開十餘年交鋒論辯的史學問題，包含梳理該書連繫的法國史學發展脈絡，以及重新檢視論辯過程中，推動法國婦女史接納性別研究的佩羅、戴堡（Françoise Thébaud）、法桑（Éric Fassin）等學者，對於該書和其引發之書評事件的敘事視角。本文透過兼具史學史和事件敘事的脈絡性分析，提出目前學界未及辨識和討論的兩個研究方向和觀點，其一是重建法國婦女史的「性別轉向」時刻；其二是指出奧祖夫和斯科特從 1995 年書評事件到 2011 年的「法式女性主義」論戰，雙方論點的對立性，涉及兩種理解法國歷史的方式：奧祖夫對傳統史學的批判研究，或稱「歷史批判」（histoire critique），⁵是為了（重新）書寫民族；而斯科特踐行的「批判歷史」的性別分析，則是為了拆解共和主義的普世主義等建構當代法國民族認同的敘事。

二、「爲所有人而作」的《女性的話語》： 民族史學批判和其瓶頸

奧祖夫於 1995 年出版的《女性的話語》，雖是促使法國婦女史在性別研究議題上，與法國主流史學的爭議檯面化的「觸媒」，但該

5 歷史批判一詞非特定史學理論專有名詞，用以指稱年鑑學派建立對傳統史學方法和民族史觀進行反思批判的史學實踐，例如成立於 1966 年的史學期刊《歷史筆記：歷史批判期刊》（*Cahiers d'histoire. Revue d'histoire critique*）即取此意。中文亦可譯為史學批判。本文英文篇名和摘要保留原文，以免與斯科特的性別分析的「批判歷史」（“Critical History”）混淆。

書實為奧祖夫向好友佩羅及其窮盡心力壯大的婦女史領域的致敬之作。奧祖夫和佩羅皆受益於二戰後共和政府重啟的高等教育體系，畢業後，兩人同被分發到諾曼第省的一所高中任教。⁶在擔任教師期間，成為金玉之交的她們共同經歷了嫁為人婦，隨夫婿返回巴黎並踏入史學界等生涯變化。她們都選擇十九世紀社會史作為起點，一起踏上為當代法國史學拓展先驅性研究的學術道路。佩羅自 1970 年代創立婦女史，從社會史的問題意識和研究路徑，專心一意為此新研究領域開展多面向的方法論。她與中世紀史家杜比（Georges Duby）共同主編的五卷《西方婦女史》於 1991 和 1992 問世。該書確立了婦女史在法國學界的學科合法性，也首度獲得了國際能見度。

不同於摯友，奧祖夫在同意出版社邀稿，提筆構思《女性的話語》之前，未曾涉足婦女史。不過，回首來時路，她自認總是迎向「未知領域的冒險」（une escapade en terre inconnue）（Ozouf, 1995b: 140）。當她從教授高中哲學轉入史學研究，不也為社會史領域開拓了法國共和時期的教育史研究？（Ozouf, 1963, 1984）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史著即便汗牛充棟，眾史家彼此闡釋的觀點和政治立場分歧對立，她不也兼顧了歷史批判與實證研究，為該領域寫下一篇篇名聲卓著的學術論著，甚至承擔起戰後史學界第一部《法國大革命辭典》的編撰大業？（Furet et Ozouf, 1988; Ozouf, 1976）於是，當《西方婦女史》帶動相關議題的學術討論和書市買氣時，奧祖夫應允了出版社的提案，撰寫一部兼具文采和專業知識、面向大眾的婦女史作。她在十八至二十世紀的三百年裡，挑選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知名的羅

6 佩羅畢業於索邦大學歷史系，奧祖夫則通過哲學科的國家考試，於 1951 年暑假結束後開始高中教職生涯。有關兩人在這段教書期間的結識經過，佩羅和奧祖夫都在各自自傳中提及（de Baecque et Deville, 2019; Perrot, 1987）。

蘭夫人（Madame Roland）、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家西蒙·波娃（Simon de Beauvoir）等十位菁英女性，並根據她們留下的私人書信、文學作品、自傳書寫、政治論述、學術文章等多樣化的文獻，為讀者獻上她們的話語、屬於她們的生命史。《女性的話語》可說是奧祖夫探索「未知領域」的嘗試之作，不只因其涉足婦女史，更體現在她採用人物素描形式，以及兼具文學批評、社會文化史探討和哲思隨筆的散文式風格，藉以取代史學論文的呈現形式。在〈後記〉（“postface”）裡——全書唯一出現大量學術論文使用註腳的書頁處，她將前述十位女性的個別故事和話語結束於闡釋「法國的獨特性」這個命題。可以說，奧祖夫透過〈後記〉為該書添上了第十一位法國女性，亦即她本人的話語。

〈後記〉中，奧祖夫特地指出十八世紀蘇格蘭哲人休謨（David Hume）讚譽當時法國貴族沙龍社交文化為「法國的獨特性」。她即從十八世紀沙龍女主人為兩性互動打造的「快樂溝通」（“commerce heureuse”）的社交模式和歷史情境切入，比較當代法美社會的兩性關係，並指出美國女性主義的性別研究有強化兩性對立之虞。她認為在兩性關係的社會氛圍上，法國較美國來得和諧並看重對話，這是因為法國社會擁有由女性主導與創造的兩性社交文化等彌足珍貴的歷史遺產。〈後記〉以下述文字收筆：「本書經常提及的那十位女士〔……〕她們留給我們的話語，由她們寫下的話語，關於她們的話語，並非專為她們而作。而是為所有人而作，期待著交流，確信擁有相通的語言和共同的信念」（Ozouf, 1995a: 397）。若說〈後記〉的收尾，同時傳達作者意欲和讀者搭建兼具知性與感性的交流也不為過。奧祖夫甚至向她長期擔任期刊編委的《爭鋒》請纓，主動提案對《女性的話語》舉辦一場書面式的書評論壇，含作者答辯文一併於當年最後季號

刊登。

奧祖夫在〈後記〉裡，不僅抒發她對當代兩性文化的個人偏好感受，也針對女性主義學者帶入十八世紀文本和歷史詮釋的性別批判觀點，從方法論角度提出商榷。她對於女性主義者「反覆的說，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解讀啟蒙與反啟蒙思想，這些思想都只關心男性」(Ozouf, 1995a: 338) 這般論斷，深不以為然。她以女性主義學者「無情」(“sans tendresse”) 看待的盧梭為例，建議從十八世紀女性讀者的視角來理解這位哲士的作品，探究她們對其闡釋的兩性觀，何以表達「熱烈的贊同」(“assentiment enthousiaste”) (Ozouf, 1995a: 335, 336)。再者，斯科特認為法國大革命人權論的認知悖論在於，將人權的普世性寓於「白種男人的特殊性」之中 (Scott, 1989)。對此詮釋觀點，專研大革命史和共和教育史的奧祖夫更難表認同。她舉數例反證，包括引述當時支持普世人權論的孔多塞 (Nicolas de Condorcet) 在授予女性公民權與否的問題上，主張「人類或是沒有任何一個人有真正的權利，或是所有人都享有同樣的權利」(Ozouf, 1995a: 350)。然而，奧祖夫注意到，對孟德斯鳩、盧梭等歷史人物和其作品的分析與詮釋，即便提出再多反駁女性主義者觀點的論據和論證，他們並不因此而放下「女性主義批判」(Ozouf, 1995a: 337)。更始料未及的是，她自己和《女性的話語》將成為接受《爭鋒》書評論壇邀請的斯科特，前後長達十餘年的批判對象。

《爭鋒》邀請的五位書評學者皆以法國史為專業領域，⁷其中三位

7 有關這五篇書評及奧祖夫的答辯書，除了原初刊登於《爭鋒》的法文版本，英文的選錄版本，參閱：Célestin, DalMolin, and de Courtivron (2003)。在這部從跨國和跨領域視角反思當代女性主義發展的論著中，有一專章以「女性：一場法國獨特性之辯」(Women: A French Singularity) 為題，收錄了巴丁德、斯科

是十八世紀史家：沙龍婦女史家巴丁德（Elisabeth Badinter）、啟蒙思想史家巴茲叩（Bronislaw Baczko），以及與奧祖夫一樣從法國大革命史跨足婦女史議題的杭特（Lynn Hunt）。他們對該書的評論是以互動共鳴為基調，或為書中呈現的女性生命史賦予畫龍點睛的點評，或是增添論據來深化作者提出的詮釋觀點，以及出於靈感發想的歷史反思。相較此三位的點評，斯科特和佩羅這兩位美法婦女史界領軍性人物卻抨擊連連，以致陷入錯愕費解的奧祖夫在答辯書寫道：

除了對《爭鋒》和那些以如此批判的警惕態度閱讀我的書的諸位女士和一位男士，懷抱感謝之外，我的第一反應是難以置信。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年輕的無辜者，發現自己參加了一場戰鬥，而他確信自己是自願報名參加的（甚至是他自己宣布的），他揉了揉眼睛，既被一場意外的暴力場面所吸引，又有一種矛盾的不真實感和無力感，奇怪地相信自己將不會被交戰火焰所波及。因為許多投向這些書寫的砲彈，尤其是其中的一個，似乎是瞄準了一本想像中的書——無論如何，那本書不是我的。為了花更多的時間來處理那些真正擊中要害的批評，我首先想把那些不穩定的砲彈打退回去。（Ozouf, 1995b: 140）

〈後記〉中，奧祖夫將她對於美法女性主義的比較，對於性別研究的批評等觀點收束於說明「法國的獨特性」，此舉引發佩羅和斯科特猛烈的批評。對奧祖夫而言，佩羅至少符合學術性辯論的基本要件，即以正確理解作品為前提，向她的作品提出「真正擊中要害的批評」。

特和奧祖夫三篇文章。很可惜，該論著對於美法兩地史學發展與女性主義的關係和比較，並無關注與討論。

但斯科特卻出於錯誤解讀而投射一連串離題、離譜的批評——奧祖夫喻以「不穩定的砲彈」(“boulets erratiques”)——甚至指控《女性的話語》有「反美主義」(anti-americanism)之嫌(Scott, 1995: 139)。面對《女性的話語》一書迎來出乎意料、甚至難以視為建設性指教的批評和誤解，奧祖夫在深感震驚和錯愕的反應當下，也意識到她對自身所在之當前歷史(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的時刻，有未及覺察之處。奧祖夫透過撰寫答辯書，嘗試走出被動定義的客體位置，回溯自己踏入婦女史這個「未知領域的冒險」旅程的來時路，到底在哪些接觸環節上，不及辨識學術世界的變化或是誤讀變化的意義？

值得探究的是，在一場書評論壇定義的學術交流語境中，斯科特提出「反美主義」此一政治性審判的用意何在？⁸很可惜，奧祖夫在答辯書中僅以該指控過於離題而不予置評。斯科特認為奧祖夫的「法國的獨特性」是扭曲女性的話語和歷史，攻擊了美國女性主義並拒絕性別研究，如此解讀無疑是在鞏固法國民族史。為了解除桎梏當前婦女史研究的民族認同思維和歷史敘事框架，斯科特藉由指控「反美主義」來影射作者發出排他性的民族主義訊息。研究十九與二十世紀歐洲各國民族史書寫和變遷的貝格爾(Stefan Berger)指出：「在二十一世紀初，幾乎沒有一位專業史家還願意公開宣稱自己對統一的民族敘事抱有無可置疑的信念」(Berger, 2007: 52)。《女性的話語》將法國民族文化認同寄寓在具有悠久傳統的、由女性創造的兩性交流藝術和實踐的信念，是與貝格爾觀察的歐美史學界質疑「統一的民族敘事」趨勢相逆。難道說，法國史學在歐美學界於二戰後對於十九世紀民族主義史觀的批判和反思活動中是缺席的？還是說，奧祖夫個人不及覺

8 關於這個問題，奧祖夫答辯當下沒有提出來，在她或斯科特日後接受學思歷程訪談，談及該場書評論壇，也不曾再議。

察學術世界的變化，或是不及適應變化，以至於她未及解構的民族認同史觀遮蔽其理解和接納美國性別研究，甚至懷抱《女性的話語》是為「所有人而寫」的錯誤期待？這些問題涉及當代法國史學發展以及奧祖夫參與的「新歷史」（“Nouvelle Histoire”），故本節先行梳理相關學術史脈絡。

歐洲十九世紀盛行的民族史書寫，烙印了自身民族文明優越性等排他性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也背負了合理化國家之殖民帝國事業、助燃兩次世界大戰等負面意義。有鑑於此，二戰之後西歐各國學校的歷史教育和史學研究雖然延續民族框架，但學界亟需提出替代傳統史觀意識和敘事議題的方案。⁹在法國，年鑑學派（l'école des Annales）通過新舊學術機構推動的史學教學和研究，將研究焦點集中於現代民族國家誕生之前的中世紀和近代早期。¹⁰直至1980年代，不論是延續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拉布魯斯（Ernest Labrousse）等重視的社會經濟史和跨區域比較研究，還是向考古學、人類學、文學研究汲取新研究取徑的「新歷史」，¹¹皆重視對十九世紀實證史學範式和傳統民族史觀予以批判，是謂歷史批判研究。在不涉及殖民統治、帝國軍事擴張和世界大戰等，形塑現今世界格局和問題挑戰之政治議題的條件下，「新歷史」為法國史學開闢一條通過方法論批判更新民族敘事的研究道路，可謂以「社會史」來替代傳統的民族史書寫。¹²在

9 針對歐洲各國二戰後的民族史書寫情形，參閱：Berger（2005）。

10 舊的學術機構有巴黎索邦大學，新的有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

11 宣示「新歷史」的兩部代表性作品為 *Faire de l'histoire*（Le Goff et Nora, 1974）和 *La Nouvelle Histoire*（Le Goff, Chartier, et Revel, 1978）。最早討論「新歷史」的史學史著為 Coutau-Bégarie（1983）。

12 費夫賀（Lucien Febvre）強調社會史乃是研究法國社會方方面面的「總體史」

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和諾哈（Pierre Nora）主編的《創造歷史》中，作為十九世紀以降法國民族史敘事核心的法國大革命，也開始進入了歷史批判的討論議程。除了諾哈針對遠離政治和事件史的年鑑史學主流範式，提出「事件回歸」的新問題，奧祖夫則提出有別於傳統政治史的研究方法，為《創造歷史》十餘項新選題中添入「節慶」，示範從政治文化視角分析大革命期間，為紀念歷史性事件所建置的各式節慶其組織和形式，以及不同人群與城市對節慶紀念之事件傳達的差異性體認和意義（Ozouf, 1974）。

奧祖夫從共和教育史跨入法國大革命史研究，並與任教於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福雷特（François Furet）緊密合作。1978 年福雷特發表的《思考法國大革命》，對蘇博（Albert Soboul）等左翼史家建構的法國大革命史正統敘事¹³予以知識論批判。福雷特通過拆解左翼馬克思主義史觀加諸法國大革命的美化性詮釋，劍指戰後作為政治領域主流認知的共和主義民族認同（Furet, 1978）。¹⁴此舉引起法國學界激烈辯論，也啟發諾哈反思民族國家的記憶和歷史書寫問題，編撰《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émoire*, 1984-1992）。¹⁵該書接受福雷特的歷史批判視角，將十九世紀國家藉慶典紀念大革命等歷史事

之意。年鑑史學在 1950、1960 年代側重探究社會的經濟問題，是為社會經濟史；1970 年代後期的「文化轉向」，帶動起社會文化史研究（*Histoire socio-culturelle*），本文行文中將之簡稱為「文化史」。

13 蘇博任教的索邦大學於 1891 年成立「法國大革命研究所」。

14 有關福雷特的學思歷程及 1968 年以降針對法國大革命左翼史觀的史學反思，參閱 Christofferson（2009）；Prochasson（2013）。

15 有關諾哈對法國民族史書寫的反思，參見他為該書第二卷以「複數法國」（*Les France*）為題的單元，一篇寫於 1992 年導言性質的〈如何書寫法國史〉（*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Nora, 1997/1992）。國內有關該書的介紹和說明，參見戴麗娟（2012）為中譯版所寫的〈譯者導言〉。

件來凝聚民族認同情感的活動，包含當時史家們的歷史書寫，視作認識和分析的對象。此書將事件的國家記憶、神話建造等意義生產放置於歷史脈絡之下，詳細檢視和考證「法國如何成為當前法國」，為讀者——包含學術社群和社會人士——提供了一條對當前法國「自我理解」的史學取徑。是故，不同於福雷特的歷史批判有解構當今法國共和主義—民族認同之意，諾哈的歷史批判是為了當今法國的「自我理解」。

在《記憶所繫之處》和《新歷史》相繼問世之際，諾哈又推出一部有關當代史家自我理解的論文集，《自我的歷史》(*Essais d'ego-histoire*, 1987)。他在為該書寫的〈引介〉(“Présentation”)中，再次提及法國史學主流「對當代史的強烈不信任感，認為當代史離我們太近，不值得積極對待」。他雖然依憑前著《記憶所繫之處》明確反駁道：「對現今(*le présent*)的歷史理解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他也洞察到，將現今法國作為歷史理解對象的史家，反身批判性的自我分析才是啟動知識論轉輪的關鍵：「每個人怎麼可能不把自己看成是研究的對象，而史家又怎麼可能不率先受到雙重挑戰呢？」(Nora, 1987: 6)。史家做自我分析的雙重挑戰在於，反身提問生長在現今歷史時刻的自我是「如何成為」時，必然連帶反思自己如何成為史家、如何形成加諸研究對象的歷史認知等問題。

對諾哈而言，「自我歷史」是一種史家自我分析的知識論途徑，屬於史家內在意識範疇，有助史家成為認識和理解現今歷史現象和問題的主體者。也就是說，作為史家自我覺察的「自我歷史」是一種不間斷的、進行式的智識反思。諾哈曾說明「自我歷史」是受到多位史家自傳性書寫的啟發，而奧祖夫的寫作則是最接近他「自我歷史」一

詞表達的意涵。¹⁶自諾哈倡議史家將自我分析落實於寫作並出版《自我的歷史》以降至今，「自我歷史」一方面成為一種新型的史學主題和書寫文類，¹⁷另一方面也為史學研究提出一個新的分析視角，得以檢視特定史家是否並如何覺察自己對歷史書寫的介入——屬於未經嚴謹事實檢驗和邏輯論證的主觀意識或是自我認同的價值判斷？¹⁸

從二戰結束之後到諾哈出版《自我的歷史》這段由年鑑學派主導之歷史批判研究期間，史家們在十九世紀民族史書寫遺留的問題上，建立了學術的自主性。其一是早期年鑑學派繞開形塑民族國家和民族史書寫的十九世紀和政治（事件）史，專注於中世紀和近代早期，開發社會經濟、心態文化等多維視角和議題的研究模式。其二是「新歷史」將十九世紀以降形塑民族國家認同的記憶活動和歷史書寫，作為反思對象的研究模式。第二種學術自主性的歷史環境，尚交錯著法國大革命兩百週年紀念、蘇聯解體、冷戰國際格局結束等歷史性與政治性事件，敦促法國學界愈發關注二戰結束後之現今時期的政治和事件研究。¹⁹值得注意的是，諾哈主編的《記憶所繫之處》為當代法國

16 是指奧祖夫在為一部共和教育史著撰寫的序文中，回憶自小接受共和教育的經驗（Ozouf, 1984）。諾哈引述的其他學者有：Ariès（1980）；Goubert（1984）；Winock（1978），參見 Nora（1987: 6）。

17 法國史學界最新的「自我歷史」集體之作為 Potin et Sirinelli（2019）。

18 根據諾哈，他本人和接受其邀請為《自我的歷史》寫作的史家們（Maurice Ahulhon, Pierre Chaunu, Georges Duby, Raoul Girardet, Jacques Le Goff, Michelle Perrot, René Rémond）皆意識到這項訴求史家自我分析的史學實驗，或有暴露癖、個人秀（*exhibitionnisme*）之虞（Nora, 1987: 7）。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 1986）也曾在1980年代反思學者發表的學思經歷等傳記性書寫的虛幻性問題。

19 如二戰期間維琪政權遺留的政治和法律問題、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六八學運等。社會學家 Michel Dobry（1986）向學界倡議「接觸事件」。

的自我理解開創出的史學取徑，既達到拆解十九世紀以降環繞民族國家所營造的神話之效，也為史家對於自身所在之斯土斯國和民族文化歸屬感，釋放了言說和書寫空間。布勞岱爾在 1986 年出版的《法蘭西認同》（*L'identité de la France*），即體現一種結合作者過去針對法國從地理環境、經濟與社會生活和區域比較等多維角度進行的實證研究，以及表述個人根植鄉土和悠久歷史之民族情懷的史學作品（Braudel, 1986）。

在法國「新歷史」解構了十九世紀意識形態化的民族史之後，重新圍繞民族展開書寫的嘗試之作相繼出現。以奧祖夫在《女性的話語》一書為例，作者以「法國的獨特性」觀點詮釋法國女性創造的兩性溝通文化。²⁰若僅採用斯科特以「反美主義」一詞暗指該書重現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批評之意，實有抹除奧祖夫身處的法國史學界，在民族史書寫上建立學術自主性的歷史性和複雜性之虞。²¹然而，即便斯科特對奧祖夫的批評有其個人策略選擇和表述風格因素，卻也反映美國學界在 1980 年代中葉到 1990 年代中葉跨大西洋學術交流密集的時期，為解構「民族」、「社會」等指向集體單一性或整體統一性的概念，而進行知識論反思和研究討論的客觀環境。一如法

20 在《記憶所繫之處》法文版第三卷「複數法國」單元，有兩篇分別闡釋交談（*La conversation*）、殷勤有禮（*la galanterie*）等關於十七世紀貴族沙龍文化的文章，收錄在該單元第二部分「傳統」（*Traditions*）的「獨特性」（*Singularités*）子題。

21 1982-1985 年間，奧祖夫曾和多位專業史家參與有關中小學歷史教育的論壇，根據 Laurence de Cock（2019）的研究，當時史家們提出兩個對立性的方案，其一是奧祖夫等學者支持的「需要向異域文化和世界開放，並將移民人口相關主題納入學校歷史教育」，另一個則是強調「共和國計劃的普世性，並認為有必要回歸政治史，且最好以國家領土為中心」。有關奧祖夫和支持第二個方案的學者辯論，參閱 Nicolet（1985）；Ozouf（1985）。

國的歷史批判研究，即便剖析了過去由官方、知識界和社會人士建構之神話和意識形態所促成的民族認同，並不意味著參與研究過程的史家們正在自我解構自身的民族身分，抑或是棄置民族視角的歷史研究和寫作。同樣的，法國婦女史界趨向接納美國性別研究一事，也存在不同階段的歷史性。下一節將從佩羅的自我歷史敘事切入，說明法國婦女史與美國女性主義和性別研究的接觸過程，並指出她為《女性的話語》撰寫的書評，實已傳達出她在法國婦女史「性別轉向」一事上按下的「加速鍵」的訊號。

三、兩個時刻： 法國婦女史的「性別轉向」與「法式女性主義」

與美國對照，法國大學機構開設婦女史課程，同樣源於 1970 年代美歐女權運動，以及學界推動女性主義暨婦女研究的社會和學術環境中。佩羅是第一位在大學開設婦女史課程的法國史家，並於 1980 年代後期透過諾哈的《自我的歷史》，將此新興領域帶入「新歷史」的知識視野裡。²²根據佩羅的自述，1949 年西蒙·波娃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問世那年，她就讀索邦大學，正準備與經濟史家拉布魯斯討論碩士論文主題。受到該書啟發，佩羅向指導教授表示自己有興趣探討女性主義。拉布魯斯以年鑑學派的作風回應，認為歷史研究需與當前的社會議題保持學術距離，並建議佩羅研究十九世紀上半葉勞工聯盟（*coalitions ouvrières*）議題（Perrot, 1987）。²³佩羅在

22 佩羅（Perrot, 1997/1992）曾為《記憶所繫之處》撰寫一篇談十九世紀勞工生活的文章，但文中未涉及婦女或兩性關係議題。

23 佩羅回憶拉布魯斯聽到她想探討女性主義議題之後，面露微笑的回應：「您想

1970 年代初，完成了一部研究十九世紀勞工罷工運動史的國家博士論文（Perrot, 1974），並取得新成立的巴黎第七大學的教職，之後持續透過課程研讀美國女性主義和婦女研究，並與研究生共同思考「女人有歷史嗎？」（“les femmes ont-elles une histoire?”），探索如何書寫婦女史等攸關此一新興領域的知識論和方法論問題。²⁴

佩羅在為《自我的歷史》撰寫的專文中，為了說明自己何以這麼晚才成為婦女史家，她先回溯自小在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中養成以男性作為唯一智識楷模的自我意識。對比象徵學術知識和文化涵養的「男人們世界」（“monde des hommes”）——包含有「男性俱樂部」之稱的索邦大學——散發的吸引力，她對「女人們世界」（monde des femmes）避之唯恐不及。是故，她在青少年時期甚少結交女性朋友，成年之後也不喜歡參加全為女人的聚會。在她奔向原本專屬父親、指導教授的男性世界，期許自己在此世界與男性同學、或未來與男性學者平等並肩的過程中，她將該世界長久以來用以區隔並貶抑女性而建構的諸般矛盾和刻板說法，毫無懷疑和抗拒地照單全收了。佩羅指出過去的自己原來如同一個「不在現場的女人」（“femme alibi”），並以此代價換取成為男性世界的一員（Perrot, 1987: 288-291）。

佩羅透過回溯自己變成「不在現場的女人」的歷程，說明她何以至完成博士論文、脫離「學徒」位階，在大學機構取得專任教職後，

要做的主題是非常即時性的（“sujet très actuel”），參見 Perrot（1987: 277）。

- 24 法國的女權運動研究、婦女史研究誕生於 1970 年代，其相關研究單位成立在索邦大學和社科院等巴黎學術核心圈的外圍以及外省，如巴黎地區的第七大學婦女史研究中心、里昂大學的女性主義研究中心（Centre lyonnais d'études féministes [CLEF]），以及普羅旺斯大學（Aix-en-Provence）的婦女與女性主義研究中心。

方能憑藉獨立學者的身分涉足婦女議題，為法國學界開創婦女史領域。在文章的結語處，她寄寓該領域的願景，明顯呈現一種根植於戰後法國歷史批判研究的知識論框架：

雖然我希望為這種歷史視角〔指婦女史〕的重新評估做出貢獻，但我無意成為一名婦女問題專家，更無意將婦女史確立為一門專業。在我看來，最危險的事情莫過於設立保留區——女性歷史學家的領地，一個新的「隔離區」(ghetto)：在那裡，婦女們將把自己封閉起來，彼此陪伴為樂，排除任何對抗，進而排除任何影響。此外，根本不存在什麼「女性主義科學」或是「無產階級科學」。……如果兩性關係 (le rapport des sexes) 作為社會演變的一個基本層面，卻受到了壓抑，那麼考慮到這一點，就應該通過擴大我們的問題範圍和觀察方式，更新我們對歷史的理解。(Perrot, 1987: 292)

由這段結語可以得知，1980 年代法國婦女史遠非歷史學科的獨立學門。在第二本婦女史期刊於 1995 年創立之前，該領域的最新研究均刊登於婦女研究或是綜合性學術期刊，而非史學專業期刊。²⁵諾哈主編的《爭鋒》早在 1981 年就刊登了斯科特專為法國抑或歐陸法語學界讀者而寫的〈美國婦女史十年回顧〉(Scott, 1981)。對佩羅而言，起步晚於美國學界的婦女史，除了借鑑英語世界研究，更需與本地史學建立學術對話關係。²⁶因此，她即便清楚自己所在的史學主流

25 斯科特寫於 1986 年的“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一文，法語譯文刊登在比利時的婦女研究期刊 (Scott, 1988)。

26 根據斯科特所述，1970 至 1980 年 10 年期間，美國學群在歷史學系和婦女研

不待見婦女研究等當代議題，更對兩性關係問題無感，依舊嘗試藉由年鑑史學對於社會史賦予「總體史」等強調多維視角分析和思辨的方法論經驗，設想有關婦女的歷史研究。此外，佩羅甚至將先前「新歷史」對意識形態化的左翼民族史書寫之批判經驗，用於警惕婦女史切勿掉入另一個女性主義意識形態所造成的認知謬誤。

佩羅對於女性主義的疑慮，²⁷也表現在她選擇用「兩性關係」（relations entre les sexes）這個不帶後設意涵、指向客觀存在之人際互動事實的說法，來解釋婦女史並非剔除男性的單性史。當她為《自我的歷史》撰文時，儘管斯科特闡釋性別方法論的知名文章尚未被翻譯成法語，但美國女性主義和婦女研究開創的性別分析，已藉由譯文引介至圍繞佩羅發展的婦女史群體。不過，直到為《西方婦女史》撰寫總序（與杜比共同署名），佩羅依舊避言「性別」一詞，並倡議婦女史家從「再現（représentations）、知識、權力和日常實踐等各個層面」研究兩性關係及其變化的歷史（Duby et Perrot, 1991）。²⁸佩羅因顧慮本地史學的接納程度或是法國婦女史的主體性，而未跟隨美國學界轉向性別研究的訊息，構成了奧祖夫在撰寫《女性的話語》一書時所認知的學術世界，也就是說，她和佩羅仍舊共享年鑑學派樹立的歷史批判研究模式和知識論框架。

在奧祖夫的答辯書中，面對佩羅指責她欠缺美國女性主義的專業知識，卻貿然地比較美法兩地學界和社會接受女性主義的差異表現等

究大規模地開設婦女史課程，並擁有專業期刊、定期性研討會和論文集等，多樣與多量的學術發表管道和研究成果。對比之下，佩羅在1987年卻用「隔離區」形容法國婦女史在成員規模和思辨交流的侷限性。

27 佩羅疑慮婦女史採用女性主義的觀點，當時也見於其他婦女史家表述，如Lagrange（1990）。

28 這篇11頁的總序在版面設計上沒有標註頁碼。

「擊中要害」的批評，她最不解之處在於，不論是比較美法兩地的問題意識、或是評論內容本身，她可曾發表前人未曾提出過的看法？奧祖夫首先交代了自己何以涉入她不熟悉的女性主義領域：

當時我正在閱讀美國女性主義的暢銷書，它們提出了一些問題：為什麼這裡〔指法國〕的女性主義運動沒有像那邊〔指美國〕那樣享有同樣的知名度和能量？為什麼法國的女性主義抗議活動沒有達到同樣的激進程度，只有少數例外？為什麼法國的婦女史研究在大學裡不斷擴大其規模，卻沒有〔和美國史家一樣〕根據這個新的歷史，來重寫法國整體的歷史？為什麼法國人抵制把同性別的人當成一個特定身分群體²⁹來看待？（Ozouf, 1995b: 140-141）

她認為，對前述問題的關注和思考，本是美法兩地學者普遍共有的。由於「每個國家的女性主義抗議都採取了如此不同的路線，這喚起了我們的好奇心，並要求我們做出解釋。……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在我的書中，這樣的不對稱性觀察似乎是可恥的，而當它來自於其他人筆下時，卻被平靜地接受」（Ozouf, 1995b: 141）。她舉出佩羅等熟悉女性主義研究的法國學者，用同樣的民族比較視角闡述美法兩地差異的觀點：「克萊爾·杜肯（Claire Duchon）剛剛做了同樣的觀察，她在想是否可以『女性主義在法國的影響力很小』作為結論。米歇爾·佩羅認為，法國女性主義……經常被連到『軟弱』（“faiblesse”），這已是一種陳詞濫調了……米歇爾·佩羅還明確指出，在法國歷史

29 指美國的性別身分政治之意。

上，『缺乏女性社團的生活』。我還寫過什麼嗎？於是我的不真實感受增強了」³⁰（Ozouf, 1995b: 141）。這段奧祖夫引述佩羅的文字和呈現的討論語境，應該是出自佩羅於1994年發表在美國期刊的一篇文章（Perrot, 1994）。這篇文章是為了回應美國女性主義史家對《西方婦女史》的批評。在美國女性主義史家看來，該書顯示出法國婦女史家「缺乏雄心」，未能與她們一樣突破法國學術機構的制度性藩籬和知識論框架。佩羅則大力辯解該書兼具法國和美國兩地婦女史研究方法；至於法國婦女史如何突破學術體制藩籬的問題，她表示：「我們的態度說明了，通過約束和選擇，我們走過的道路為融合而不是分離，這在總體上即是法國女性主義的特點。」佩羅將結論的觀點定調為一種假設，以表開放討論、集思廣益之意：「在法國，婦女往往希望避免與另一性別對抗，甚至希望吸納這種對抗。這可能是由於政治文化的原因：法國婦女的『性別意識』和『我群〔指女性社群意識〕』在這個個人主義的民主社會中，是不能達到美國社會的水平，或許也無法採用同樣的形式」（Perrot, 1994: 55-56）。

奧祖夫明顯響應佩羅向學界拋出的溝通討論之邀，透過《女性的話語》一書表達她支持好友提出的觀察和體驗，即法國婦女在兩性關係上重視融合共處而非激化衝突、對立和分離。奧祖夫既立基於佩羅等先前參與美法女性主義和兩性關係比較的法國學者意見，又從歷史溯源角度來解釋當代法國社會兩性融合且愉悅的文化特質——承襲於十八世紀貴族女性主導的沙龍社交——何以不同於美國社會。然而，佩羅遺憾奧祖夫勾勒的女子圖鑑，「雖有女英雄，卻缺乏行動者」，

30 根據奧祖夫，引文出自 Claire Duchén (1995)。或許考慮到篇幅、學者知名度，奧祖夫在答辯書中並未一一寫下她引述之學者的書目來源，例如提出「法國例外」（“exception française”）的巴丁德（Elisabeth Badinter）和佩羅的觀點。

批評作者缺乏性別意識，呈現「沒有衝突」（“sans affrontements”）的婦女史（Perrot, 1995）。

由佩羅指導博士論文的戴堡（Françoise Thébaud）曾於 2015 年向華語學界說明，法國婦女史在 1990 年代因《西方婦女史》的出版而密集地展開與法國學界的跨學科對談，與美國學者進行跨域交流，並伴隨這些討論和思辨而「進入內省階段，同時也受到來自英語國家學界的影響，逐漸採用了性別研究的方法」（Thébaud, 2016／苑莉莉譯，2016: 81）。《女性的話語》在法國婦女史「逐漸」採用性別研究的進程中，無疑起到了「加速」作用。事實上，佩羅對該書的評論呈現她在婦女史領域長達二十餘年的研究生涯裡，當時最新的內省狀態。經歷早期從社會史角度認識婦女家庭關係、勞動工作等整體生活經驗和處境之後，婦女史於 1980 年代後期，與提出私生活研究的文化史，不只在研究對象有交集，也在突破社會史研究範式的知識探索上有共同的興趣。³¹到了 1990 年代，佩羅的兩性關係研究已採納文化史所關注的象徵意義之再現和社會實踐雙重面向，用以分析性別差異自然化、規範化的論述和權力機制。《西方婦女史》出版後，法國婦女史家已經走過必須從排斥婦女議題之史學主流取得方法和論點的歲月——這曾是他們與國內同儕共享之學術環境唯一被認同和理解的知識論框架。因此，並非知識性因素促使佩羅在書評中為婦女史的「性別轉向」進程按下「加速鍵」，而是為了改變文化慣性：當代法

31 佩羅在最新出版的訪談式自傳中，回憶 1980 年代婦女史與文化史的親近性、建立的學術交流和合作的關係，特地點名杜比的《騎士、婦女與神父》（*Le Chevalier, la femme et le prêtre*）、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的《歡場女孩》（*Les Filles de noce*）、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的《私生活史》（*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等（Perrot et Castillo, 2023: 37-38）。

國婦女史亟需脫離《女性的話語》如鏡像般映照的「沒有對抗」的婦女史。

戴堡最先回應佩羅發出「性別轉向」的訊號。她在1998年出版的首部法國史學史《書寫婦女史》中發表支持性別研究的聲明，說明著書的動機之一，是為了抵制奧祖夫的《女性的話語》「對婦女史學科領域的負面影響」。只是，從戴堡的表述語境來看，《女性的話語》之於婦女史的「負面影響」說法，遠非已發生的歷史事實，而是一種風險預估，藉以表明彼此的對反立場。她在引述佩羅批評《女性的話語》呈現一個兩性世界不存在衝突關係的婦女史之後，指稱該書「可能加深人們對法國史家的不信任及婦女史在制度上的邊緣化」（Thébaud, 2007/1998: 17-18）。

1990年代初期，因應美法學者圍繞兩地女性主義實踐和婦女史研究的差異性問題展開的討論，佩羅於1994年的文章中提出美法「國情」差異的解釋觀點，並表示開放意見與想法的交鋒。奧祖夫在《女性的話語》透過闡釋「法國的獨特性」以表她支持佩羅和其他立足國情差異的觀點，也同樣向讀者釋放「期許交流」的訊息。從此對話脈絡來看，戴堡在為法國婦女史撰寫的史學史中，並不是將《女性的話語》和書評論壇的爭辯事件，視作為歷史研究的認識對象，而是當成她和佩羅為婦女史突破主流史學框架的對抗對象。換言之，通過批判《女性的話語》，佩羅為婦女史選擇了對抗的道路，戴堡則為此新道路鋪陳了歷史敘事。於是，在戴堡的敘事中，奧祖夫與佩羅1994年文章所建立的對話關係消失了，且奧祖夫對美國女性主義與性別研究的疑慮和批評，與1990年代法國學界對美國政治、社會和學術界發生的「政治正確」問題所做的批評論述，一併被視為「反美主義」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

自斯科特用「反美主義」一詞批評《女性的話語》之後，該詞一再出現於戴堡等論及該書的歷史敘事之中。長期研究當代美法學界交流現象的法國社會學家法桑（Éric Fassin），不僅批判本國學界的民族本位，同時也警覺性別作為一種批判性概念工具，在國際化過程中出現政治化和規範化的新問題。他在 2008 年回顧《女性的話語》引發的書評事件，雖也討論佩羅 1994 年的文章，指出她曾和奧祖夫一樣從國別視角定性美法婦女史的差異。但是，法桑行文中明顯淡化了佩羅與奧祖夫前後的對話關係。此外，法桑重述斯科特和戴堡的「反美主義」說法，遺憾「法國學術界」（“le monde savant français”）在該書經歷「政治性審判」（“procès politique”）之後，「關閉了性別問題的大門……。拒絕與性別相關議題的英語作品進行對話」（Fassin, 2008: 383-384）。法桑所稱的「法國學術界」不專指史學界，且當時法國主流學術機構確實尚未積極透過開設課程、舉辦研討會、教職開缺等制度性措施，向性別研究敞開大門。此外，從奧祖夫在發表答辯書後十餘年的出版品來看，面對加諸《女性的話語》的「反美主義」標籤、有害婦女史創新研究的批評言論，她不再發聲辯駁。不過，與她的沉默相比——或可解釋為「拒絕與性別相關議題進行對話」——性別研究和討論在法國學界日益顯著。據法桑的觀察：

自 2000 年以來，在學術領域，如文章和書籍的標題，以及期刊和編輯集的名稱所示，越來越常見到這個詞〔指性別〕；該詞甚至已經進入研究界的機構類別。翻譯提供一個很好的說明。歷史學家瓊·斯科特在 1988 年用法語發表關於性別問題的首篇文章之後，幾乎沒有著作再被翻譯成法語，直到 1998 年，她的《自相矛盾的女公民》（*La Citoyenne paradoxale*）問世。該書似乎

是對莫娜·奧祖夫的回應。該書追溯了法國大革命的女性主義批判和當前的平等訴求之間的聯繫。至於哲學家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1990 年在美國出版的開創性作品《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直到 2005 年終於被翻譯成法語。（Fassin, 2008: 384）

在這段敘事裡，有關斯科特法文譯作的介紹，法桑並未提供完整的書訊。從 1981 年《爭鋒》刊登的〈美國婦女史十年回顧〉和其他諸篇法譯版文章來看，斯科特是以十九世紀法國女性勞工研究起家的婦女史家身分進入法國學界視野。例如，她從女性主義批判角度分析女性進入的勞動市場，指出工作和任務性別化、相應的低報酬分配等遭到社會史階級分析視角所忽視的問題，為法國學界提供了新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成果（Scott, 1991, 1992; Tilly and Scott, 1978/Trad. Lebailly, 1987）。關於法桑猜想《自相矛盾的女公民》一書是斯科特對奧祖夫的回應，前文曾論及，就斯科特主張法國大革命的普世主義和人權概念為男性專屬的文章，奧祖夫曾在《女性的話語》列舉多例作為反證，包含共和主義推行男女共同接受教育的政策等歷史經驗。書評論壇結束之後，斯科特在法國出版的作品集中於分析普世主義和人權概念的抽象個人主義等，自大革命以降至今被法國共和主義視為政治核心價值觀的論述。在 1990 年代後期到 2010 年的十餘年間，斯科特先後探討了法國大革命以降女性爭取公民權的歷史，分析 1999 年法國政府推出引發社會人士之間立場對立的民事伴侶法（*Pacte civil de solidarité* [PACS]），以及 2004 年穆斯林女學生佩戴面紗入校、引發

官方禁令和輿論爭議等問題。³²斯科特指出，不論是歷史上爭取公民權的法國女性主義者，還是支持共和主義的普世主義論述範式的當代法國人，他們既接受性別不平等的自然化說詞及其形塑的性別差異文化，又相信普世主義無分性別的抽象個人主義說法。在她看來，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認知思維，不只在過去造成法國女性爭取公民權窒礙難行，也是當今法國在民事伴侶法案、禁戴面紗等公共政策和社會議題面臨「普世主義論述危機」的癥結所在（Scott, 1996/Trads. Bourd  et Pratt, 1998; Scott, 2005/Trad. Riv re, 2005; Scott, 2007a）。

斯科特運用其性別分析的「批判歷史」，剖析歷史上構成當今法國共和主義信念的論述，藉以指出訴求共和主義的女性主義的認知矛盾。本文認為，奧祖夫和斯科特在史學知識旨趣上最大的衝突在於，奧祖夫的歷史批判是為了重寫民族，意指移除過去主導民族史書寫的神話迷思和意識形態濾鏡之後的重寫，斯科特以法國為對象的「批判歷史」則是為了解構民族敘事，尤其是歷史上圍繞民族認同形塑的共和主義—普世主義的政治價值觀論述，以及奧祖夫等「法式女性主義者」捍衛的民族文化，即互動融洽的兩性關係。他們在民族敘事的對立性，也體現在對傅科的差異解讀。

斯科特回憶 1980 年代在布朗大學加入校內女性主義學者的多學科研研討會上，傅科等「法國理論」帶給她的知識論衝擊：³³

32 法國政府 2004 年 3 月 15 日頒布禁止在公立學校佩戴明顯宗教標誌的法令。

33 斯科特在訪談中列舉在布朗大學時期接觸的「法國理論」（French Theory），包括：「後結構主義」的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傅柯、傑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德曼（Paul de Man）；精神分析領域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拉康（Jacques-Marie- mile Lacan）和拉普蘭什（Jean Laplanche）；以及「法國女性主義」的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西蘇（H l ne Cixous）、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對我來說，〔傳科〕《詞語與事物》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傳科對從文藝復興到古典時代構成的歷史和政治辯論的範疇提出了質疑：歷史，當然還有作為人的屬性的理性、作為個人固有權利的主權、作為個人理想條件的自由，或者真理、性、人、性別差異等等。所有這些都成為可塑的、不斷變化的術語，而理解和知識正是建立在這些術語之上的。甚至歷史事件的概念也被顛覆了：至此以後，事件是話語的披風外套，是創造價值、意義和主體的概念性變異。（Krikorian, Mangeot, Ponticelli, et Zaoui, 2014）

帶著這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知識論轉變」經歷，斯科特在接受《爭鋒》邀約評論《女性的話語》一書時，極度不解而質問奧祖夫，被她說成「激進」的美國女性主義的理論根基（*racines théoriques*）明明源自法國，為什麼卻在法國迴響甚少？（Ozouf, 1995b: 141）奧祖夫在答辯書回應了斯科特這個問題，認為美國的「性別女性主義」（“*féminisme du gender*”）的「選擇性」閱讀視角有過於簡化傳科的思想之虞：

我們可以理解性別女性主義對傳科的要求：首先，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解釋為權力關係，它無處不在，無處不滲透，微觀而無限制；其次，將自我肯定為不可剝奪的價值，絕對有權獲得真實的個性，獲得異質性，直接從尼采那裡尋求盡可能不同的存在模式，否認所有共同的道德。這無疑是對傳科的一種非常簡化的解讀，很少將思考主體之匱乏的傳科與關注自身（*le souci de soi*）的傳科聯繫起來，跳過了他思想的豐富蜿蜒，直達似乎是至關重要的東西：性差異的解構，對個人獨特性的勝利肯定，對共同規範的憎恨，對普遍性的拒絕。（Ozouf, 1995b: 144）

奧祖夫並不拒絕閱讀傳科，而是指出其圍繞個人和集體關係開展的思辨想法本身即存在張力，不同意將之簡化為單一意義而運用於研究歷史，或是用於合理化性別研究所強調，個人從所有集體性的、規範性的、普遍性身分中解脫出來的觀點和立場。對比斯科特選擇性地挪用傳科來建構性別研究，賦予婦女史知識論的主體性和批判歷史的思想武器，奧祖夫對傳科的閱讀則是年鑑學派跨學科對話的閱讀模式。

上文已指出，年鑑學派透過跨學科建立的歷史批判研究，例如以社會為主體的社會經濟史和社會文化史敘事，取代國家民族為主體的政治史敘事等，其目的雖然遠非解構民族史書寫——暫且不論諾哈倡議的「自我歷史」書寫反倒有鼓勵史家抒發個人民族文化情懷之效——卻樹立了精進史學方法、反思史學知識論謬誤的學術典範。在 1990 年代與法國婦女史和美國史學界對話密切的文化史，即率先在研究方法上超越「新歷史」的範式。文化史採納了義大利微觀史學家的批評意見，將研究焦點從社會經濟或是集體性心態等結構性分析，轉向關照結構化環境裡行為者的實踐。如同書籍史研究開始思考作品在讀者接受端的閱讀和挪用情形，提出有別於「新歷史」運用統計分析書籍種類與總量之計量方法的新問題和新分析途徑。³⁴文化史和書籍史研究領域的代表性人物，可以 1980 年代晚期起即活躍於跨大西洋的學術交流平臺的夏提葉（Roger Chartier）為例，他在一部專論史學方法和知識論反思的《如臨深淵》（*Au bord de la falaise*, 1998）書中，對美國學界盛行「語言學轉向」，研究偏重分析話語和拆解敘事，忽略具體的社會歷史和物質世界，表示擔憂（Chartier, 1998: 108-125）。書中以專章討論傳科從論述形構的知識體系拆解宰制個體和身

34 有關法國書籍史研究借鑑義大利微觀史學而開展閱讀史研究方法的學術過程，參閱秦曼儀（2008）。

體的微權力分析，但是，他提出的「傅科讀傅科」（“Foucault lecteur de Foucault”）的解讀方式，和奧祖夫對「性別女性主義」式的傅科閱讀所指出的質疑，兩者實傳達同樣的學術思維，即在運用傅科的思想於歷史研究之時，必須考慮傅科生前對自己闡釋的思想進行的反身性批判面向，避免簡化誤用（Chartier, 1998: 191-208）。

奧祖夫和夏提葉在民族敘事的書寫實踐，以及跨大西洋對話經驗上，有明顯的「代際」差異，卻在傅科閱讀上共同體現年鑑史學跨學科對話的閱讀模式：既需要透過跨學科的知識學習來激發多方位認識歷史現象所需的觀察視角和問題意識，同時從具體的社會歷史和物質條件構成的脈絡視角，識別理論論述中時代錯置、甚至去歷史性的謬誤詮釋。斯科特以當代和現今法國為對象的「批判歷史」，提出一種不同於年鑑史學理解過去的方式：她調查性別差異等不平等的歷史如何形成且持續至今，通過解構分析共和主義的普世主義、兩性和諧的民族文化等敘事，介入和修正歷史。

除了《自相矛盾的女公民》等多部法文譯作上市，還可從另外兩個面向看出斯科特的「批判歷史」在法國學界有了明顯的能見度，甚或接受度。首先，斯科特專為法國學界受眾說明其「批判歷史」概念和方法的作品問世（Scott, 2009），³⁵加上法桑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積極引介和討論性別研究（Fassin, 2009; Fougeyrollas-Schwebel,

35 英語作品參見Scott（2007b）。感謝匿名審查人提醒注意美國史家固德曼（Dena Goodman）為斯科特《自相矛盾的女公民》英文版，寫過書評（Goodman, 1997）。固德曼在書評中指正斯科特對於法國歷史上個人主義和共和主義論述，所加諸的「批判歷史」分析和詮釋，多處犯有誤讀、意義扭曲之嫌。奧祖夫早先在《女性的話語》，同樣是以史學方法論來檢驗斯科特等女性主義學者謬誤的歷史詮釋問題。有關美國史學界對於斯科特「批判歷史」的回應和討論，或待日後有專文研究。

Planté, Riot-Sarcey, et Zaidman, 2003），法國學界對斯科特將再次介入法國時事議題、對法國兩性文化發表的批評意見，已做了接納的思想準備。

2011 年，斯科特在法國主流媒體平臺上，與奧祖夫等法國學者進行論辯。這場論戰起因於一樁法國政治人物在美國被入住的酒店女服務生控告性侵犯而遭捕入監的事件，當時國際及新聞媒體將此一刑事案件導向為議論法國的兩性文化。³⁶相較於英國媒體譴責法國權貴和著名男性的「有罪不罰意識」（“sense of impunity”），《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則強調法國這邊，除了政壇人士抗議被告人「是美國刑事司法系統的『受害者』」，媒體輿論傾向把崇拜權勢男性調情行為（sexual swagger）的文化議題和性脅迫行為（sexual coercion）的司法議題區別論之。透過觀察和比較英法輿情差異，《紐約時報》設置議題邀請讀者投書：「法國的女性是否對男性的不當行為（male misbehavior）更加寬容，無論是公然的不忠還是對同事的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或者這是一種不公平的刻板印象」（*New York Times*, 2011）？

斯科特是回應的讀者之一。她認為法國的政治文化縱容權勢男性的不當性行為，從奧祖夫著書推崇法國兩性調情的「誘惑藝術」

36 這起英語媒體稱之為「DSK 事件」（*DSK Affair*），原告納菲薩圖·迪亞洛（Nafissatou Diallo）是移民自牙買加的單親母親，被告是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的法國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多明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被告於 2011 年 5 月 14 日在紐約甘迺迪機場準備登機返國之際被捕入監。三個月後，被告被判無罪結案。這樁涉及權勢男性對女性施加不當性行為的權力問題討論，相比 6 年後（2017）由美國好萊塢影視產業女性揭露導演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職權性脅迫並掀起全球範圍響應的 #MeToo 運動，DSK 事件和其重燃斯科特與奧祖夫多年前的爭論戰火，回音箱效應主要跨大西洋兩岸的學術界和女權運動界。

(“the art of seduction”)可見一斑。她指責奧祖夫和頌揚法國情慾文化的史家克勞德·哈比卜(Claude Habib)，大力支持諸如女性透過成為男性欲望的對象以獲得權力等謬論，卻排斥女性主義、懷疑它是來自美國的舶來品(Scott, 2011a)。斯科特的批評論點明顯再次向奧祖夫下戰書。面對斯科特突兀攻擊舊作、貶抑她為反女性主義者，奧祖夫決定與數名學者連署聲明法國婦女在兩性關係上展現的智慧和能動力，強調法國的兩性互動模式有其歷史根源、文學敘事、集體記憶等傳統和文化特色。聯名發文的學者採用先前在法國媒體《世界報》(*Le Monde*)投書的社會學家岱里(Irène Théry)所提的「法式女性主義」(“*Féminisme à la française*”)一詞，³⁷藉以表明法國當代女性從過去承繼了包含女權運動在內的文化和傳統，並且和歷史上的法國女性一樣，總是根據當下環境和情勢需要，來重新賦予歷史遺產新的意義(Habid, Ozouf, Raynaud, et Théry, 2011)。

對斯科特而言，女性主義是對抗兩性不平等的理論和實踐，因此，女性主義是多種的、複數的。斯科特批評「法式女性主義」倡議者捍衛作為法國民族文化特色的性別差異之兩性情慾文化，明顯與女性主義「在性別和權力問題上存在分歧」，「她們宣稱兩性關係是道德問題，不屬於政治範疇。而我則認為，家庭和夫妻——無論結婚與否——都是行使權力關係的機構」(Scott, 2011c)。在這起性醜聞案掀起的輿論風暴，以及由媒體定調話題焦點的話語環境中，奧祖夫等「法式女性主義」倡議者的論述含有對文學作品的詮釋、對歷史文

37 岱里在《世界報》以「一種法式女性主義」(“*Un féminisme à la française*”)為題，反駁斯科特於《紐約時報》的文章(Théry, 2011a)。奧祖夫的聯署文章是在法國媒體《解放報》於6月9日刊登斯科特回覆岱里的文章(Scott, 2011b)之後發表的。

化的思辨，但這並不利於在網路化的媒體空間和論戰語境下進行邏輯縝密的論述推展，更遑論倡議者彼此之間對文本和歷史的詮釋觀點並不一致。³⁸「法式女性主義」論述的最大困境在於倡議者身處民族敘事式微的話語環境，卻用「法式」一詞來強調具有民族特色的女性主義。倡議者意識到這個困境，故強調她們透過「法式女性主義」來闡釋個人的歷史體會和女性主義實踐。³⁹多位研究女權思想和運動的法國學者，也加入了這場媒體論戰。他們對「法式女性主義」倡議者宣稱自己是在師法過去的法國女性，深不以為然，駁斥她們將民族認同寄寓於兩性情慾文化的「法式女性主義」，實不存在於過去的女權運動歷史之中（Lagrange, Laure, Sébastien, et Eleni, 2011）。⁴⁰

引發這場「法式女性主義」論戰的性醜聞案，經美國司法調查，在三個月後無罪釋放被起訴方，爭論也隨之結束。這場交鋒不僅彰顯「法式女性主義以傳奇的政治、社會和家庭騎士精神為基礎，而盎格魯—撒克遜的女性主義則以兩性之間的絕對對抗為基礎」兩個性別觀的對立而已（Fraisie, 2011）。因為，當初作為斯科特解構法國共

38 有鑑於媒體與論界顛倒因果關係，以為「法式女性主義」倡議者支持「不對稱的調情誘惑之趣」（“les plaisirs asymétriques de la séduction”）而反對斯科特，岱里在發表與奧祖夫等學者連署文之後，投書網路媒體，釐清「法式女性主義」論戰事件的起源：「首先，人們忘記了是瓊·斯科特發起了對法式女性主義的論戰，特別是與 DSK 事件有關的論戰，而我本人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在《世界報》上發表了評論。讓我們來看看事實：莫娜·奧祖夫和克羅德·哈比卜都沒有參與這場辯論，我也不確定他們兩人（他們甚至不同意對方的觀點）是否贊同我在 DSK 事件上的立場」（Théry, 2011b）！

39 奧祖夫在性別議題上有側重文化性和個人的選擇與實踐之意，可惜論戰期間或是之後，不論當事人或是評論該論戰的學者未及辨析和闡釋。

40 斯科特在論戰結束後第二年發表的《女性主義者歷史的幻想》，闡述同樣的論點（Scott, 2012）。

和主義論述範式切口的《女性的話語》，如今再次「為人作嫁衣」：加速集結法國女性主義等社會科學研究「性別轉向」的動員力量。⁴¹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間，斯科特將「批判歷史」用於評論時事，指出法國共和主義的普世主義、世俗主義等單一性與統一性思維和敘事，不僅於過去歷史中限制了女權運動的發展，亦對當今社會中來自前殖民地的穆斯林移民者，產生遠非包容理解而是排斥和歧視的政策與輿論氛圍。斯科特的「批判歷史」可否作為當前法國學術社群反身性批判之用？從這個反思視角來考察距今已有十年之久的「法式女性主義」媒體論戰，或是三十年前《女性的話語》引發的書評論戰，本文認為與其重述法國婦女和性別史既有論述，以「反美主義」、「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等具有標籤性效應之貶義詞加諸奧祖夫身上，更應從史學史脈絡、事件當下建構的意義語境等角度，認識法國婦女史「性別轉向」的時刻、「法式女性主義」論戰的時刻，以及在這些時刻裡，奧祖夫與她的《女性的話語》尚未被當今主流敘事包容理解的經歷和故事。

四、結語：兼談性別轉向後的婦女史研究近況

對我來說，進入一個時期的重要途徑是通過它的議論和辯論，那些不斷被拋出的、懸而未決的問題，那些似乎不可能達成共識的

41 從「法式女性主義」論戰到2017年《性別的百科全書》問世這段法國學界樹立性別研究新典範期間，幾部帶有相挺「法式女性主義」之意的美國姊妹聲音，從大西洋彼岸響起，甚至回傳法國，包括：《紐約時報》駐法記者寫的《誘惑：法國人如何培養生活情趣》（Sciolino, 2011）；美國知名法國婦女史家瑪莉蓮·亞隆寫的《法式愛情：法國人獻給全世界的熱情與浪漫》（Yalom, 2012）。

問題。核心衝突或軸心辯論是一個時期的重要標誌或路標。核心的分歧問題是描述一個社會或一個時代特徵的好方法。(Davis et Crouzet, 2004/Trans. Davis and Wolfe, 2010: 84)

研究近代早期法國史的美國學者戴維斯在《鍾情史學》(*A Passion for History*)這部通過訪談講述其學思歷程的書中，解釋她從人們圍繞在特定議題形塑中心和分歧的爭論切入，認識該社會和時代特徵的治史方法。奧祖夫因發表的《女性的話語》一書，涉入了與美國女性主義史家斯科特跨幅長達十餘年的論戰，包括 1995 年的書評論壇及 2011 年的媒體輿論場等兩場交鋒。她在回覆書評的答辯書中，對自己身為論戰主角一事，充滿驚愕不解的心情。本文因此嘗試探問，這位專業領域為研究近代早期和十九世紀的史家，如何對一樁發生在當下此刻的爭論事端，以當事人的位置來理解爭論事端的來龍去脈、辨識論戰正在形成的意義，甚至重新省視自身史學見解？奧祖夫雖然沒有從她和諾哈於 1980 年代共同構思的「自我歷史」之自我分析視角來撰寫答辯書。然而，她對於該書在構思過程中搭建之學術對話脈絡的回溯，透露出她嘗試理解自己究竟是在哪一個交會點上誤讀訊息，抑或未及覺察她身處之學術世界的變化。畢竟，她在該書〈後記〉對女性主義和性別研究發表的評論意見——被佩羅批評為魯莽妄議——不僅是依憑她長年歷史批判實踐形成的學術見解，且與佩羅等專家學者已發表的觀點「所見略同」。在奧祖夫的認知裡，佩羅領軍的法國婦女史在向女性主義和性別研究進行的跨學科知識借鑑的過程中，長久以來保持學術自主性所需的思辨距離。是故，最令她震驚的，莫過於好友竟認同美國學者先前用以質疑法國婦女史的觀點，批評《女性的話語》是一部「沒有對抗」的歷史。如果說，佩羅

在寫給奧祖夫的書評裡，發出了婦女史性別轉向的訊號，戴堡則藉由《書寫婦女史》，向奧祖夫等學界「反美主義」的保守勢力，發佈了檄文。

從 1995 年最初法國婦女史「性別轉向」的時刻，距今已近三十年。斯科特的「批判歷史」方興未艾，為近十年法國婦女與性別史研究所觸及的、卻為過去年鑑史學範式排除不論的議題，如當代法國的殖民帝國統治、後殖民現象等，⁴²提供了分析性別、階級、族裔、政治和知識文化等多重宰制權力所交織疊加之歷史的分析視角。⁴³至於古代史家、研究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本國史家，則提出年鑑史學治史方式的性別史研究方案：

古代學者、中世紀學者和近代早期學者敦促性別研究適應他們的歷史對象，並警告不要將最新近〔與性別有關的〕各種概念和類別，泛化到所有歷史時期。他們與萊特（Didier Lett）⁴⁴共同提出了「性別制度」（“régime de genre”）的概念，即有關「在不同的歷史、文獻資料和人際關係等背景下，兩性關係呈現其特殊且

42 早在 1950-1960 年殖民解放運動期間，Aimé Césaire 和 Frantz Fanon 兩位法國前殖民地出生的學者即發表了後殖民批判的經典作品（Césaire, 1955; Fanon, 1961）。有關法國殖民帝國、殖民地的歷史研究，在千禧年之後始具有能見度，包含 Bancel, Blanchard, et Vergès（2003）；Dulucq（2009）。

43 在 1995-2010 年期間，與戴堡共同擔任《克里奧：歷史、婦女與社會》期刊主編的福奈樂（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是最早研究加勒比海地區的法國前殖民地歷史的婦女史家，參閱 Zancarini-Fournel（2010b, 2019）。此外，《克里奧：歷史、婦女與社會》在 2011 年曾推出「殖民」（Colonisations）專號刊；2019 年已更名為《克里奧：婦女、性別、歷史》，又推出「加勒比海世界的性別」（Le genre dans les mondes caribéens）專號刊。

44 萊特自 2015 年擔任《克里奧：婦女、性別、歷史》的主編。

獨有的配置安排」。(Thébaud, 2019: 748)

在斯科特和奧祖夫兩次論戰期間，致力婦女史「性別轉向」的戴堡，如今欣然接納「更加關注行為方式和實際情況，而不是各類〔性別〕身分認同」的「性別制度」史研究，並附和言道：「因此，性別是一個並非一成不變的概念，婦女和性別史的知識探險仍在繼續，而且似乎可以保證後繼有人」(Thébaud, 2019: 748)。在此性別史「在地化」的時刻，本文認為法國史學界與性別研究之接觸經驗的歷史，需要走出過去婦女史學史的敘事框架，重新省視奧祖夫採用的「歷史批判」和斯科特倡議的「批判歷史」，這兩種對法國不同的歷史理解方式，曾經呈現二元對立化的時刻，是通過哪些事件、話語的交鋒、敘事編寫與回聲複述而形成的。至於「法國在地化」的性別史為當前法國創造何種有別於拆解抑或維護共和主義—普世主義的新歷史敘事，新敘事又與整體政治社會文化之間建立何種關聯性、對話性等問題，尚須多方觀察，日後將專文討論。

參考文獻

- 秦曼儀 (2008),〈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41: 257-314。doi: 10.6253/ntuhistory.2008.41.06
- 戴麗娟 (2012),〈譯者導言〉,皮耶·諾哈 (Pierre Nora) 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第 I 冊),7-13。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
- Thébaud, Françoise 著,苑莉莉譯 (2016),〈法國與美國婦女和性別史比較研究——自《西方婦女史》出版以來〉,《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6(1): 79-85。doi: 10.13277/j.cnki.jcwu.2016.01.011
- Ariès, Philippe (1980). *Un historien du dimanche*. Paris: Édition du Seuil.
- Bancel, Nicolas, Pascal Blanchard, et Françoise Vergès (2003). *La République coloniale: Essai sur une utopie*. Paris: Albin Michel.
- Berger, Stefan (2005). A return to the national paradigm? National history writing in Germany, Italy, France, and Britain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7(3): 629-678. doi: 10.1086/497719
- Berger, Stefan (2007). The power of national past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y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In Stefan Berger (Ed.), *Writing the n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pp. 30-62).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ourdieu, Pierre (1986). L'illusion biographiqu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62/63: 69-72.
- Braudel, Fernand (1986).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T. 1-3). Paris: Les Editions Arthaud-Flammarion.
- Célestin, Roger, Eliane DalMolin, and Isabelle de Courtivron (2003). Debate.

- Women: A French singularity. In Roger Célestin, Eliane DalMolin, and Isabelle Courtivron (Eds.), *Beyond French feminisms: Debates on wome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980-2001* (pp. 225-23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doi: 10.1007/978-1-137-09514-5_21
- Césaire, Aimé (1955). *Discours sur le colonialism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 Chartier, Roger (1998). *Au bord de la falaise. L'histoire entre certitudes et inquiétude*. Paris: Albin Michel.
- Christofferson, Michael Scott (2009). *Les intellectuels contre la gauche. L'idéologie antitotalitaire en France (1968-1981)*. Marseille: Agone.
- Coutau-Bégarie, Hervé (1983). *Le phénomène «Nouvelle Histoire». Stratégie et idéologie des nouveaux historiens*. Paris: Economica.
- Davis, Natalie Zemon and Joan Wallach Scott (1992). A new kind of history. In Pauline Schmitt Pantel (Ed.),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 (Vol. I, *From ancient goddesses to Christian saints*, pp. 7-8).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Natalie Zemon et Denis Crouzet (2004). *L'Histoire tout feu tout flames. Entretiens avec Denis Crouzet*. Paris: Albin Michel. Trans. Natalie Zemon Davis and Michael Wolfe (2010). *A passion for history: Conversations with Denis Crouzet*. Kirksville, MO: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De Baecque, Antoine et Patrick Deville (Dirs.) (2019). *Mona Ozouf. Portrait d'une historienne*. Paris: Flammarion.
- De Cock, Laurence (2019). Enseigner l'histoire. In Yann Potin et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Dirs.), *Généralisations historiennes, XIX^e-XXI^e siècle* (pp. 754-768). Paris: CNRS éditions.
- Dobry, Michel (1986). *Sociologie des crises politiques, La dynamique des*

- mobilisations multisectorielles*.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 Duby, Georges et Michelle Perrot (1991). *Ecrire l'histoire des femmes*. In Georges Duby et Michelle Perrot,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T. I, *L'Antiquité*, none pages). Paris: Plon.
- Duchen, Claire (1995). Féminisme français et féminismes anglo-américains: Spécificités et débats actuels. In Ephesia (Dir.), *La place des femmes: Les enjeux de l'identité et de l'égalité au regard des sciences sociales* (pp. 352-357). Paris: La Découverte.
- Dulucq, Sophie (2009). *Écrire l'histoire de l'Afrique à l'époque coloniale, XIX^e-XX^e siècles*. Paris: Karthala.
- Fanon, Frantz (1961).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Paris: Maspero.
- Fassin, Éric (2008). L'empire du genre. L'histoire politique ambiguë d'un outil conceptuel. *L'Homme, Miroirs transatlantiques*, 187/188: 375-392. doi: 10.4000/lhomme.29322
- Fassin, Éric (2009). *Le sexe politique. Genre et sexualité au miroir transatlantique*. Paris: Éditions de l'EHESS.
- Fougeyrollas-Schwebel, Dominique, Christine Planté, Michèle Riot-Sarcey, et Claude Zaidman (Dirs.) (2003). *Le genre comme catégorie d'analyse. Sociologie, histoire, littérature*. Paris: L'Harmattan.
- Fraisse, Geneviève (2011/8/11). Affaire DSK: le fait divers, c'est du politique. *Libération*. Extrait de <https://www.mnemosyne.asso.fr/mnemosyne/category/actualites/dossier-controverse-a-propos-du-feminisme-a-la-francaise/>
- Furet, François (1978).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 Furet, François et Mona Ozouf (1988).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Flammarion.

Goodman, Dena (1997). More than paradoxes to offer: Feminist history as critical practice. *History and Theory*, 36(3): 392-405. doi: 10.1111/0018-2656.00022

Goubert, Pierre (1984). Naissance d'un historien: hasards et racines. In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Etudes réunies en l'honneur de Pierre Goubert* (pp. 9-13). Paris-Toulouse: Société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et Editions Privat.

Habid, Claude, Mona Ozouf, Philippe Raynaud, et Irène Théry (2011/6/17). Féminisme à la française: la parole est à la défense. *Libération*. Extrait de <https://www.mnemosyne.asso.fr/mnemosyne/category/actualites/dossier-controverse-a-propos-du-feminisme-a-la-francaise/>

Krikorian, Gaëlle, Philippe Mangeot, Adèle Ponticelli, et Pierre Zaoui (2014/1/11). History trouble. Entretien avec Joan W. Scott. *Vacarme*. Extrait de <https://vacarme.org/article2325.html>

Lagrange, Rose-Marie (1990). Recherches féministes ou recherches sur les femme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83: 27-39.

Lagrange, Rose-Marie, Bereni Laure, Roux Sébastien, et Varikas Eleni (2011/6/30). Le féminisme à la française, ça n'existe pas. *Libération*. Extrait de <https://www.mnemosyne.asso.fr/mnemosyne/category/actualites/dossier-controverse-a-propos-du-feminisme-a-la-francaise/>

Le Goff, Jacques et Pierre Nora (Dirs.) (1974). *Faire de l'histoire* (T. 1-3).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Le Goff, Jacques, Roger Chartier, et Jacques Revel (Dirs.) (1978). *La Nouvelle Histoire*. Paris: Retz.

- New York Times (2011/5/18). The opinion pages. Room for debate: Are French women more toleran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roomfordebate/2011/05/18/are-french-women-more-tolerant>
- Nicolet, Claude (1985). Réponse à Mona Ozouf. *Le Débat*, 34: 179-181. doi: 10.3917/deba.034.0179
- Nora, Pierre (1997/1992).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2219-2235).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 Nora, Pierre (Dir.) (1987). *Essais d'ego-histoir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 Ozouf, Mona (1963). *L'École, l'Église et la République, 1871-1914*. Paris: Armand Colin.
- Ozouf, Mona (1974). La fête: Sou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n Jacques Le Goff et Pierre Nora (Dirs.), *Faire de l'histoire* (T. III, *Nouveaux objets*, pp. 342-370).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 Ozouf, Mona (1976). *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 1789-1799*.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 Ozouf, Mona (1984). L'image dans le tapis. In *L'École de la France: Essais sur la Révolution, l'utopie et l'enseignement* (pp. 7-24).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 Ozouf, Mona (1985). Réponse à Claude Nicolet. *Le Débat*, 34: 175-179. doi: 10.3917/deba.034.0175
- Ozouf, Mona (1995a). *Les Mots des femmes. Essai sur la singularité française*. Paris: Fayard.
- Ozouf, Mona (1995b). Le compte des jours. *Le Débat*, 87: 140-146. doi: 10.3917/deba.087.0121
- Perrot, Michelle (1974). *Les Ouvriers en grève. France 1871-1890* (T. 1-2). Paris: Mouton.
- Perrot, Michelle (1987). L'air du temps. In Pierre Nora (Dir.), *Essais d'ego-histoire*

- (pp. 241-292).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 Perrot, Michelle (1994). Où en est en France l'histoire des femmes? *French Politics and Society*, 12(1): 39-57.
- Perrot, Michelle (1995). Une histoire sans affrontements. *Le Débat*, 87: 130-134. doi: 10.3917/deba.087.0111
- Perrot, Michelle (1997/1992). Les vies ouvrières.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3937-3971).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 Perrot, Michelle et Eduardo Castillo (2023). *Le temps des féminismes*. Paris: Bernard Grasset.
- Potin, Yann et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Dirs.) (2019). *Générationnelles historiennes, XIX^e-XXI^e siècle*. Paris: CNRS éditions.
- Prochasson, Christophe (2013). *François Furet: Les chemins de la mélancolie*. Paris: Stock.
- Rennes, Juliette (Dir.) (2016). *Encyclopédie critique du genre. Corps, sexualité, rapports sociaux*. Paris: La Découverte.
- Robcis, Camille (2017/11/10). Le genre: Théorie et pratique. *La Vie des idées*.
Extrait de <https://laviedesidees.fr/Le-genre-theorie-et-pratique>
- Sciolino, Elaine (2011). *La Séduction. How the French play the game of life*. New York: Times Books.
- Scott, Joan Wallach (1981). Dix ans d'histoire des femmes aux États-Unis. *Le Débat*, 17: 127-132. doi: 10.3917/deba.017.0127
- Scott, Joan Wallach (1986).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5): 1053-1075. doi: 10.2307/1864376
- Scott, Joan Wallach (1988). Genre: Une catégorie utile d'analyse historique. *Les Cahiers du Grif*, 37/38: 125-153.

- Scott, Joan Wallach (1989). French feminists and the rights of 'man': Olympe de Gouges's declaration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28(1): 1-21. doi: 10.1093/hwj/28.1.1
- Scott, Joan Wallach (1991). "L'ouvrière, mot impie, sordide...". Le discour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française sur les ouvrières (1840-1860).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83: 2-15.
- Scott, Joan Wallach (1992). La travailleuse. In Geneviève Fraisse et Perrot Michelle (Dirs.),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T. IV, *Le XIX^e siècle*, pp. 419-444). Paris: Plon.
- Scott, Joan Wallach (1995). «Vive la différence!» *Le Débat*, 87: 134-139. doi: 10.3917/deba.087.0116
- Scott, Joan Wallach (1996). *Only paradoxes to offer: French feminists and the rights of 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rans. Marie Bourdé et Colette Pratt (1998). *La citoyenne paradoxale. Les féministes françaises et les droits de l'homme*. Paris: Albin Michel.
- Scott, Joan Wallach (2005). *Parité! Sexual equality and the crisis of French univers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rad. Claude Rivière (2005) *Parité! l'universel et la différence des sexes*. Paris: Albin Michel.
- Scott, Joan Wallach (2007a). *The politics of the vei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oan Wallach (2007b). History-writing as critique. In Keith Jenkins, Sue Morgan, and Alun Munslow (Eds.), *Manifestos for history* (pp. 19-38). London: Routledge.
- Scott, Joan Wallach (2009). *Théorie critique de l'histoire. Identités, expériences, politiques*. Paris: Fayard.

- Scott, Joan Wallach (2011a/5/20). Feminism, a foreign import?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nemosyne.asso.fr/mnemosyne/category/actualites/dossier-controverse-a-propos-du-feminisme-a-la-francaise/>
- Scott, Joan Wallach (2011b/6/09). La réponse de Joan Scott. *Libération*. Extrait de <https://www.mnemosyne.asso.fr/mnemosyne/category/actualites/dossier-controverse-a-propos-du-feminisme-a-la-francaise/>
- Scott, Joan Wallach (2011c/6/22). La réponse de Joan Scott. *Libération*. Extrait de <https://www.mnemosyne.asso.fr/mnemosyne/category/actualites/dossier-controverse-a-propos-du-feminisme-a-la-francaise/>
- Scott, Joan Wallach (2012). *The fantasy of feminist hist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Thébaud, Françoise (2007/1998). Introduction de la première édition. In *Ecrire l'histoire des femmes et du genre* (pp. 13-27). Lyon: ENS éditions.
- Thébaud, Françoise (2019). Histoire des femmes, histoire du genre. In Yann Potin et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Dirs.), *Générations historiennes, XIX^e-XXI^e siècle* (pp. 739-748). Paris: CNRS éditions.
- Théry, Irène (2011a/5/28). Un féminisme à la française. *Le Monde*. Extrait de <https://www.mnemosyne.asso.fr/mnemosyne/category/actualites/dossier-controverse-a-propos-du-feminisme-a-la-francaise/>
- Théry, Irène (2011b/6/22). *Arrêt sur images*. Extrait de <https://www.mnemosyne.asso.fr/mnemosyne/category/actualites/dossier-controverse-a-propos-du-feminisme-a-la-francaise/>
- Tilly, Louise Audino and Joan Wallach Scott (1978). *Women, work, and famil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Trad. Monique Lebailly (1987). *Les femmes, le travail et la famille*. Paris: Rivages.

- Winock, Michel (1978). *La république se meurt: 1956-1958*. Paris: Édition du Seuil.
- Yalom, Marilyn (2012). *How the French invented love. Nine hundred years of passion and romance*.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 Zancarini-Fournel, Michelle (2010a). Histoire des femmes, histoire du genre. In Christian Delacroix, François Dosse, Patrick Garcia, et Nicolas Offenstadt (Dirs.), *Historiographies* (T. I, *Concepts et débats*, pp. 208-219).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 Zancarini-Fournel, Michelle (2010b). L'histoire mutique des Antilles et les usages du passé. In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et Christian Delacroix (Dirs.), *La France du temps présent (1945-2005)* (pp. 540-544). Paris: Belin.
- Zancarini-Fournel, Michelle (2019). Contraception et avortement dans les Antilles françaises (Guadeloupe et Martinique, 1964-1975). In Clara Palmiste et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Dirs.), *Le genre dans les mondes caribéens*, Numéro spécial, *Clio. Femmes, Genre, Histoire*, 50: 87-108. doi:10.4000/clio.17067

◎作者簡介

秦曼儀，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專業領域為近代早期法國文化史，主要從閱讀、書寫和出版等議題研究女性與社會、性別與知識的關係，開設有「近代早期法國婦女史」、「歐洲婦女與性別史」、「西方書籍史專題研究」、「歐美當代史學史」等課程。近期研究主題為近代早期法國貴族與沙龍女性的書寫和出版活動，啟蒙書籍的女性閱讀史，以及從性別與等級雙重維度考察近代早期法國「女性爭論」(La Querelle des femmes)與法國大革命的女權論述。Email: chin69chiou68@ntu.edu.tw

The Historians' Debate on "French Feminism" and Two Approach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Mona Ozouf's "Histoire Critique" and Joan Scott's "Critical History"

Man-Yi Ch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historian Ozouf's 1995 book *Les Mots des Femmes* and the debates it provoked, which accelerated the "gender turn" in French women's history. Focusing on the debates she had with the American feminist historian Joan Scott over the book's discussion of French gender culture—including the 2011 debate on "French feminism"—this article identifies a central conflict in their debates that involves two ways of understanding history: the former's "histoire critique" (or historical critical) approach to writing about the nation, while the latter's "Critical History", with France as its object of study, seeks to dismantle narratives of republican universalism and other construc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France.

Keywords: Mona Ozouf, Joan Scott, Histoire Critique, Critical History, *Les Mots des Femmes*, history of women and gender